

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内在契合

曾长秋, 欧光耀¹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受到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诸多影响,而且兼收并蓄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若干理论,因而能自如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若干观点及方法。它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剖析当代生态环境及其危机问题,为寻找化解危机的途径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的思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虽非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二者却具有内在契合性:一要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二要以合理消费来“改造异化生产”;三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关键词]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内在契合性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22)03-0049-07

DOI:10.13967/j.cnki.nhxb.2022.0038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可是当前生态危机已成为人类面临的严重自然和社会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者需面对的现实论题。当年马克思所处时代的生态环境问题不像今天这样凸显,而且他以主要精力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但其理论诉求一直认为,人类要面对另外一个根本问题: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和解”始终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追求目标,其论述虽然零散分布在其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却显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并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the Ecological Marxism)一词,来源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教授本·阿格尔,他于1979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第一次使用这个概念。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一个左翼思潮或新兴流派,正式诞生于20世纪中后期的“绿色运动”,并秉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精神,用马克思主义的若干观点思考当代生态问题,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掠夺本性,对解决当代生态危机提出了一些新思路。因而,其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具有契合之处。由于二者相容相通,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我们当前寻找化解生态危机的途径,尤其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方式,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和现实意义。

一 人与自然界有着共生共存的关系

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人类关注的永恒主题之

一,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却不能凌驾于其上,必须呵护自然。马克思从青年时代起,就十分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从生态、实践和历史三个不同的维度,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

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自然,是经过人类实践活动改造了的自然。他认为,人类生活在自然界,是其中的一员,并非“外来征服者”,“人靠自然界生活”^[1]。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现实问题。自然界向人类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慷慨赠与了一切生产和生活所需的物质资料,人以实践为“中介”,使自然界分化为“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并促使“自在自然”不断向“人化自然”转化。人类若离开了自然界,劳动就失去了生产的材料,意识也就失去了来源。以上认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础理论。

自然界为人类提供必要的生活环境,却非人类恣意的“改造对象”。人与自然界有着共生共存的关系,马克思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人为了生存必须从自然界获取生产与生活资料。“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2]92}马克思强调了自然、环境对人具有客观性,体现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人类在生产中学会了利用周边

[收稿日期] 2021-10-09

[作者简介] 曾长秋(1950—),男,湖南浏阳人,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¹ 中南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博士。

环境,也在改造着大自然,从而能够衍生人类自身。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社会是人与自然完整统一”的观点。他强调人类对自然物“用之不觉,失之难存”,需要倍加珍惜,并且批评了黑格尔所描述的自然界是“抽象的、孤立的、与人分离的”的观点。显然,马克思认为通过人类劳动的自然物体现人的本质力量,即“属人的自然界”。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只要它哪怕只停顿一年……它本身的存在也就没有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保留着。”^[3]

人们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目的是使自然界服从人的需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是有理性的存在物,不管是制造生产资料还是消费品,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构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统一。然而,人类利用自然界不是被动的,人具有主观能动性。无视自然规律,片面夸大精神力量,是“唯意志论”;听任自然摆布,否定人的主观作用,是“宿命论”。人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却可以认识和运用规律去改造客观世界。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否则将自食其果。人类也不要过分地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一旦人的主观意志膨胀,违背自然规律去“征服自然”,每一次“胜利”都可能招致自然界“报复”。人类把原始物转化为“人化的自然”,虽然其过程不能改变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却已使之成为符合人类认识与实践活动的“人类学自然界”。

实践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方式,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则是其基础。科学发展观也告诉我们,要把人放在处理人和自然关系的“中心位置”,并且以人类的根本利益作为最高的价值尺度来衡量其得失。人类可以改造客观世界,却反对违背自然规律“蛮干”。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否认以上观点,一方面认为人与自然密不可分;另一方面认为互相作用。他们明确说,人类作为自然界一部分,必须服从其内在规律,承认“第一自然”(即自然界)的优先性,同时又通过自身努力产生“第二自然”。正如西方生态学代表人物豪沃德·帕森斯所说:“离开了人类在自然中的进化和借助工具实现的面对自然的集体劳动,人类是不可想象的。人类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人改变自然的同时,也在改变自己。”^{[4]169}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高度评价了马克思以“人类尺度”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观点,诚如德国左翼学者格仑德曼所说,“自然优先性”概念的提出,“是由于考虑到人类的利益和需要”,如果不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就谈不上人类对自然界“有什么优先的、占支配的地位”。他还认为,马克思的观点与传统环保主义者不同,是因为传统环境保护主义者“一般把生态危机看做是自然的优先地位极端化的结果,而马克思把生态危机看作是缺乏自然控制的表现”^{[4]169}。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两个基本概念:一是反对以人类为中心的“异化消费”;二是发出“生态命令”企图迫使工业生产缩减。他们声称马克思主义只适应于早期资本主义,自己解决当代生态问题则更具理论的合理性和实践的可行性。他们提出了自己的变革理论,如格仑德曼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是一个有机整体,其整体性决定人类利益与自然利益的统一性。人类为了自己的利益,需要保护自然,不能以短期的掠夺方式实施“利己”行为。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斯在《自然的控制》这部著作中写道,与“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相对立的是“生态中心主义”,前者认为人类是地球上乃至宇宙间最核心的物种,而后者否定“控制自然”。“控制自然”这一观念古已有之,从古代神话到20世纪都能得到印证。他据此认为,“控制自然的任务,应当理解为把人的欲望中的非理性和破坏性的方面置于控制之下。这种努力的成功将是自然的解放,亦即人性的解放”^[5]。因此,人类既要防止为了自身需要而掠夺自然,又要纠正极端的“控制自然”观念。

在人与自然界关系上,出现了以上主要的理论观点,与西方出现的“绿色思潮”相比较,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改造自然时更要给自然界选择平等的道德价值。针对“绿色运动”鼓吹的生态中心主义,格仑德曼指出,生态中心主义幻想从“纯自然的角度的角度”对待生态问题,已经不足取。实际上,当代要达到生态平衡,明显是人在行动:一方面人类向自然界索取,一方面也要保护环境。人类既依赖自然生存又支配着自然界,对自然界进行控制必须“和谐”。格仑德曼还指出,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在于建设一个适合于人类的“第二自然”,这是人类与自然界作斗争的直接体现。英国左翼学者佩铂也认为,控制自然本身并不是造成生态问题的原因,关

键是人类要维持一个“度”,一方面依赖自然,另一方面又支配和控制自然。之所以出现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是持“特殊的方式”过度地对待自然。他还说,解决生态危机“不是自然是否被控制或在什么程度上被控制”,关键在于“如何改变自然以及谁控制了自然产品”^[6]。也就是说,保护环境并不意味着要放弃自身利益或诉求。正确做法是协调好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避免主体与客体相分离,从而确定人类改造自然的合理限度——适当“控制自然”,并正确提供估价生态环境问题的参照点。

二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对生态造成破坏

许多人将资源开发和环境问题,归结为人口过剩导致需求增加。其实不然,全球出现资源枯竭和环境退化问题,并非完全由于“人口过剩”或穷人太多,主要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富人消费奢侈。人类最初的劳动过程,人与自然环境的新陈代谢还是“比较和谐”的。这个过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却因资本的逐利性而出现了异化。

事实也是如此,从资本主义制度诞生以来,人类改造地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当今世界工业化国家约30个,人口不超过10亿,却消费了三分之二的物质财富^[7]。马克思从劳动过程的两重性出发,预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会破坏自然资源。这就是劳动既能有助于物质变换顺利实现,也能导致人与自然界分裂。劳动与产品之间出现异化,使得自然人化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不和谐。“异化劳动”的过程,劳动者出现对自己产品的异化,实际上是对自然界即整个外部世界关系的异化。资本主义具有深刻的不平等性,消费能力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它除了永无止境的资本积累之外,再无其他动力驱动社会发展。它竭力兜售消费主义文化,以此刺激经济增长,导致环境污染和资源的枯竭。正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创造剩余价值为生存形式,只会顾及生产成本而不会顾及环境保护,具有比较多的社会负面效应,因此只有社会主义实施生态战略转化才能扼制生态继续恶化。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和自然界是一体的。劳动是人的需要,是人成为人的本质体现。可是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使劳动成为人们不自愿参与的活动,这就改变了劳动对人的意义——劳动在扰乱自然界物质循环的同时,也损害了人类自身。对此,马克思认为环境问题是集体劳动异化的结果,也是资本主

义工业化和都市化带来的结果。回顾历史,在产业革命和大机器普遍采用之前,英国的家庭手工业者过着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然而,产业革命发展了机器生产,一些村镇变成工厂或城市。人口集中和城市规模扩大,生产和生活的排泄物(如工业垃圾、汽车尾气、塑料包装等)日益增加,从而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出现了一系列“城市病”。马克思深刻地揭露了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不断扩大“再生产”,毫无节制地开发自然、掠取资源,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他们为了实现生产利润和剩余价值的最大化,不惜使劳动者的身心遭到摧残,也使土地、资源等自然力遭到破坏。

当前,欧美发达国家仍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在“利润驱动”下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资本家为了追求资本的短期回报,必然忽视经济发展过程中长远的和总体性的环境规划。资本家也不会考虑对环境和资源造成的破坏,因为许多自然物是免费使用的。例如,大自然的礼物——矿石、石油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再声称,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必然不顾一切地掠夺自然。“一个厂主或商人在卖出他所制造的或买进的商品时,只要获得普通的利润,他就满意了,而不再关心商品和买主以后将是怎样的。”^{[8]386}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短期行为”,他们不断地从自然界索取资源和能量,又不断地向自然界排放废弃物。长此以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与技术相结合,不仅摧残了劳动者,也使土地、森林、草原等自然资源枯竭,导致雾霾、酸雨、粉尘、废气等污染物大量出现,碳排放超标,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干旱缺水或发生洪涝灾害、大量动植物物种灭绝、温室效应加剧。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给人和自然带来的灾难,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的失控性,将自然界推向毁灭境地。他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9]552},他还揭露了农业资本家对自然界的破坏,“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例如北美合众国,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9]552-553}。

生态文明的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否则将出现“生态危机”。所谓“生态危机”,指不合理开发而引起的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和生态系统失衡,必然影响可持续发展,甚至危及人类生存。

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将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向“第三世界”转移,居然还向不发达国家倾销工业或生活垃圾,加剧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同时,它们又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问题横加责难,不愿承担治理环境污染、减少“碳排放”等在内的义务。例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二氧化碳减排责任、资金支持、监督机制等方面分歧严重,形成僵局,因此有必要加强国际合作,以实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目标。2015年12月达成的《巴黎协定》,本来是为减少碳排放而拯救越来越寒冷的欧洲将变成西伯利亚的好事,美国却认为“不关自己什么事”,竟带头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拒绝履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义务。西方国家为了保护本国企业的利益,甚至对中国出口的清洁能源——太阳能产品加征关税。以上事实,都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的“自私性”,将人类利益抛于脑后。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基于现实状况,从人本中心主义出发,反对生态中心主义,也反对另一种粗陋的早期人类中心主义。他们不认为产生生态危机的原因是“人对环境的支配”——人类利用自然界是必然的,问题在于不能以“特殊方式”对待自然,即过分掠夺资源。他们认为,生态学与社会主义之间是相容相通的,强调应该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界破坏的现实出发,来寻找产生生态危机的原因。他们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本质上具有反生态的性质,使其在生态上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趋势。正如法国左翼学者高兹说的,每个企业都是自然资源、生产工具、劳动力等要素的联合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这些要素结合起来追求利润最大化,其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生态危机。高兹还认为,保护生态环境的最佳选择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建设生态文明已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当然,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认为“现实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一样存在严重的生态危机,也不能有效地实行生态保护,而只有“生态学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生态危机的问题。

从上可知,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反生态的本性。资本家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决定了其必然要不断地掠夺自然。西方发达国家也许能在本国或局部地区解决环境问题,它可以凭借自己强大的技术、经济、军事等优势,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性产业,输送有害有毒废弃物,变其为生态垃圾场。但这种转嫁和

缓和矛盾的做法,不可能解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佩珀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存在“成本外在化”趋向。受市场法则支配,任何企业都不愿把治理污染的费用纳入生产成本,而想尽办法使成本外在化——把它转嫁给社会。拉比卡对此愤怒地写道,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生态掠夺和剥削,是一种“生态殖民主义”^[10]。生态殖民扩张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认为它本质上是殖民主义在生态领域的反映。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利用国际垂直分工体系,通过区域化和全球化以及环境壁垒政策来实施生态殖民主义行为,从而加剧了全球生态危机。佩珀进一步指出了化解的途径,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的以机器生产、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内容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生产方式,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单纯依靠不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环保运动和哲学批判是无法解决生态危机的,必须建立社会公正、经济理性增长的社会主义社会,以取代资本主义制度。

三 化解当代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的途径

我们深知,生态系统需上亿年才能形成,而且几乎不能替代,也很少能够通过技术手段恢复。任何一个生态系统的消失,就意味着消失了一个人类生存空间。化解生态危机必须形成正确的生态意识,既要有一定的道德认识为基础,又要依赖于改造自然的实践体验。就社会和谐来说,存在多种需要协调的关系,其中最主要的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类自身和谐,即由“人与天地相对立”变成“人和天地浑然一体”。防止自然界被过度开发,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就必须以生态链为纽带,修复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如果社会要协调发展,不仅需要友好的人际关系,还需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改善人与生态的关系,就要对“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8]385}。他们进一步预言,“自由人的联合体”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状态,必须使生产方式建立在公有化的基础上。共产主义的制度框架对“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设计,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联系,都是和谐而协调发展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而不断变化,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在不断变化。同时,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也与一定的生

产方式相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据此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人与自然界尖锐对立:一方面创造了以往社会无法比拟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又导致人类与自然界矛盾激化。他们所处的时代,尽管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尚未充分暴露,但他们预测到未来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矛盾状态,警示人们必须注意生态恶化、资源浪费等问题。资本主义生产的竞争方式具有与生俱来的无政府特征,不可能在国家宏观指导下有计划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所写:公有制条件下“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已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11]。就是说,只有根除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在共产主义社会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的“两个和解”——人与人之间的“和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解”。

同样,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写道:“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脱离动物界……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12]恩格斯说的“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分别指人类在客观世界面前处于两种不同的社会活动状态。在认识上,必然王国指人类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没有真正认识而不能自觉地支配自己和外部世界;自由王国则指人类认识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并能够自觉地支配自己和外部世界。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解决,要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前提。其途径只能通过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人的复归”^{[2]120}。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有计划的生产、分配以及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类需要,必将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盲目追逐利润而带来对资源的破坏,达到人与自然之间“和解”。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解读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同时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即:他们在理论上回应了对现实的关切——分析了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探索了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矛盾、消除生态危机的途径。他们认为生态危机的形成原因很复杂,既有思想观念的原因,也有社会制度的原因。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某种共同

的价值取向,为我们深入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特征、新矛盾提供了一种独特视角。随着人类生产能力的提高,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转变——由“敬畏自然”变成“征服自然”。又随着科技进步,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能力日益增强,却也带来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由此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持其“经济理性”思维,必然造成生态危机。若要化解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其根本途径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实施生态转化战略,建立起“生态理性”思维,尽量用较少的劳动、资本和资源,制造有较高使用价值的产品,满足人类真实的需要。其途径可以通过原材料循环利用、推广节能技术等实现,避免由于经济增长导致生态环境恶化;要按照需要而不是利润来组织生产,使利润导向服从于需要导向;必须建立“新的生态文化或生态道德”,进行生态道德的培养要在实践中进行和感悟;还可以利用网络开阔人们的视野,跨越时空传输信息,了解生物圈的变化,让人们自觉地树立保护环境意识,营造美丽、清洁、舒适的生态空间,实现人类的自由、全面、健康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写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3]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距《共产党宣言》发表的年代,又过去170多年了。如果仍然追求无休止的几何增长和无限度的攫取财富,无论人类如何理性地利用资源,从长远看都是不可持续的。事实也如此——人类物质文明突飞猛进,生态环境却遭空前破坏——人口爆炸、粮食危机、资源枯竭、能源匮乏、全球变暖、冰川融化、臭氧层破坏、碳排放居高不下,造成岩石土壤圈、大气圈、水圈和生物圈等系统被空前破坏,使得灾害频发、环境恶化(包括雾霾、酸雨、沙尘暴、空气和水污染、农药对土壤侵蚀,等等),带来了席卷全球的生态危机。如果生态系统出现崩溃,将危及人类的身心健康和生活方式,甚至导致一个个物种灭绝,直接威胁人类的前途命运。

身处经济和科技发达的21世纪,人类应当认真地自我检讨并切实地节制自我欲望,防止环境质量下降。自然环境问题必然引起社会管理制度的调整,不同的管理方式则体现了不同经济基础的需要,人类需要设计各种科学合理、利于身心健康的生活方式,调整与自然的关系,从而为子孙后代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自然界是人类栖身之所,也是人类创

造活动的舞台和改造对象。我们要遵循自然规律,保持生态平衡,让生存环境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做到人与自然和谐,使人类走出——文明越发展、生态破坏越严重的“二律背反”怪圈。而要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环境、生态的矛盾,就必须对资本主义制度及生产方式进行变革,进入实现了“两个和解”的共产主义社会,让人类成为自然界真正的主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包含的生态学思想和生态思维方式,尽管也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是关于人类社会的(即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较少涉及环境生态问题)。然而,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从自己理解的角度进行阐发,不同程度地回击了对“马克思主义存在生态学空场”的指责,从另外的视角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解决当代生态问题的价值。通过以上论述,我们深深地知道,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文本支持。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必须走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这一主题的指引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全面考察,进而提出一系列关于环境和生态问题的见解。可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张从控制人与自然的观念、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深层次角度解析了当代生态危机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价值诉求具有内在一致性。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是指导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南。时不待我,我们要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以维护我们的共同家园。对此重大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兼收并蓄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若干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若干观点及方法,以批判精神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生态问题、环境问题做出认真思考,亦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的思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生态环境成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鉴于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生态问题已超越国界限制,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生态问题涉及范围之广泛、危害程度之严重以及问题解决的迫切性,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是命运共同体,保护生态环境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共同责任。生态文明建设搞好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加分项,反之就会成为别有用心势力攻击我们的借口。”^{[14]360} 他还说:“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

来,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因此,我们要努力“形成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14]364},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彰显我们的责任担当。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突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性,并指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理念方向和发展道路。即是:“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为保护生态环境作出我们这代人的努力!”^{[14]41}

总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旨在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及批判功能与人类面临的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相结合,试图寻找一种能够指导解决生态问题及人类自身发展问题的“双赢”理念,是难能可贵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虽然并非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二者却具有内在契合性,即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都应该和谐而协调发展。具体地说,其契合性主要有三点:一要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正确把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克服高消耗、高污染和资源环境约束的问题;二要以合理消费来“改造异化生产”,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和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走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之路;三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探索一条既能克服人类生态困境,又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尽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已感受到当代社会发展的脉搏,认识到因经济和科技日益发达而出现了生态危机问题,却因不恰当地夸大了生态问题,用生态危机理论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故有许多局限性。他们的视野比较狭窄,不主张改变所有制,只讲参与管理,一方面批判“集中化、官僚化和技术垄断”,过分强调民主化和“工人自治”,另一方面却主张“小国寡民”,希冀以手工劳动替代现代机器生产,这显然是空想主义和复古主义的混合体。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或许使它会成为昙花一现的历史过客。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20.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0.
- [4] 曾文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 [5] [加]威廉·莱斯. 自然的控制[M]. 岳长龄,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7: 193.
- [6] [英]戴维·佩珀. 生态社会主义: 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 刘颖, 译.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 115.
- [7] 孙贺. 现代化之路的中国超越[N]. 光明日报, 2020-06-29(15).
- [8]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10] 曾文婷.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探析[J]. 中州学刊, 2006(1): 167-170.
- [1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928-929.
- [1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757-758.
- [1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77.
- [14]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3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On the Inherent Combination of “Ecological Marxism” and Marxist Ecological View

ZENG Chang-qiu, OU Guang-yao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Ecological Marxism is not only influenced by the ecological theory of Marxism, but also incorporates some theories of Western Marxism, hence it can freely use some viewpoints and methods of Marxism. It analyzes the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its crisis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nd puts forward some inspiring ideas for finding ways to resolve the crisis. Although ecological Marxism is not the ecological theory of Marxism, both of them have an internal correspondence: Firs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should be established; Second, “dissimilated production” should be transformed by rational consumption; Third, a “socialist revolut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

Key words: ecology Marxism; Marxist ecology; inner fit

(本文编辑: 刘衍永)